

崇儒重道与满洲之道间的文化抉择

——基于国家认同的清前期国家祭祀体系的文化调适

崔 欣^{a,b}

(西北师范大学 a.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b.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清政权建立后,清朝皇帝面对的是两个文化世界:满族的传统和被征服者的传统。他们通过种种措施了解、掌握儒家文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当然,也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政治重要性高度警觉,有意识地坚守着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萨满信仰,并以此作为增强满族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关键词 清前期 崇儒重道 萨满信仰 祭祀典礼 文化调适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6)04-0056-05

DOI:10.13573/j.cnki.sjzxyxb.2016.04.008

以往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基本是以朝代更替作为框架和基础的,即以汉、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的更迭作为主要的历史发展脉络。据此学界多认为,那些由少数民族入主的王朝要想获得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必定要经过汉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这些学者强调汉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辐射的深远度以及强大的同化能力,只看到汉族文化优势的一面,将满洲文化看得过于消极。所谓“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金为变相之汉人”^{[1]40}。故此,被归纳为“汉化说”。就目前学界所归结的“汉化”的具体内涵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游离于农耕文明以及中原文化的人类群体对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调适,从而加速群体本身发展的做法与过程。然而,近些年来,新清史学派兴起,他们认为过去的清史研究过度强调满人对汉人文化的吸收,弱化甚至抹杀了满洲特性在清政权统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新清史学派认为,满人崛起于白山黑水间,以数万之众征服了中原和江南,这一切恰恰是依靠区别于“汉化”的所谓“满洲之道”(内容包括娴熟骑射、萨满祭祀、通习满语以及节俭之俗等)。^{[3]256}

然而,清朝的统治包含有满洲元素,可这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以满洲为中心,反之,纯粹的汉化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无论是“满洲中心观”,还是“汉化说”,都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将清朝的统治、清帝国的文化简单地置于一种文化视阈下理解,应该承认

清帝国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清统治者是将其糅合、调适后并用,以巩固大一统王朝这一客观事实。有清一代,清朝皇帝一面采用圜丘祭天、方泽祭地、祭拜太庙、社稷以及祭孔等国家祭祀大典治国,一面坚持以坤宁宫祭祀和堂子祭祀为代表的传统满洲萨满祭祀,以求内心回归。

一、崇儒重道与道统形象的确立

孔颖达注《左传》指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4]卷五十六}“华夏”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代表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杜赞奇认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是“礼仪”。^{[5]44-46}“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2657}。在古代,祭祀不但位列诸礼之首,而且是与军事活动同等重要的“国之大事”,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礼乐祀典表达的是对神的崇拜,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体现人对自然的敬畏。随着社会的进步,祭祀逐渐成为一种规范人们日常祭祀天神、祖先的制度,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制度成为确立国家道统、划分等级的重要标志。

满清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寻求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作为中原道统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便需借助历史上各朝代崇儒重道以及祭典过程中的一系列程式化的仪式、语言及其衍生出来的道统论述体制来维持其中原正统王朝叙事的正统性。

收稿日期 2016-04-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与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宫廷萨满祭祀在清前期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研究”(15XJC770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崔欣(1981-)男,河南卫辉人,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

(一) 祭孔仪式与崇儒重道国策的确立

祭孔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鲁哀公便下令按岁时祭祀,祭孔从此开始。^[7]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帝王多亲至孔子故里祭拜孔子。到了宋代,祭孔活动最终升格为“国之大典”,由帝王主祭。自此,孔子形象成为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的凝聚力。他作为一个道统象征被推上极其尊崇的地位。

透过祭孔话语中的道统涵义,清初满洲政权延续着夏商、秦汉、唐宋、明朝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的传承,主演祭孔祀典的满清帝王便成为“道统”的“继承人”,清初的满洲政权因而继承了中原的道统性。^[8]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这位善于审时度势的满洲统治者,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国号“大清”,年号“崇德”,它标志着“满族国家制度和统治思想,从采纳蒙古文明到采纳汉文明的历史性的转折”^[9]。同年三月初四日,“皇太极定文馆三院之名,其中秘书院职掌撰拟外国来往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遣祭孔夫子庙,撰拟死人祭文”^[10]⁴⁰¹。祭孔典礼成为清朝记录在册的国家祭祀大典。

清顺治元年(1644年),山东巡抚方大猷上书顺治皇帝,他认为,既然大清皇帝已经依据天命继承了中原王朝正统,那么就应该立即通过“尊崇先圣”^[6]³³⁰⁷的典礼仪式来确立道统传承关系。同年十月,户科给事中郝杰认为,清朝皇帝已不再只是满洲之主,已是天下之主,为此,应当且必须适度调整自我的政治角色,掌握中原王朝的政治理论。因而进言:“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11]⁵⁸⁵ 鉴于此,满清政权决定按照明朝礼遇,定期祭拜孔子,“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六日壬申(7月19日)清廷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入关后首次祭孔”^[12]²⁹,并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二日丙辰(10月31日)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颜绍绪、曾闻达、孟闻玺仍袭五经博士”^[12]⁴⁵。

有清一代,举凡祭孔,清朝帝王事必躬亲,为历代所望尘莫及。正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述:“一般来说,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越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13]²²¹ 根据《清实录·世祖章帝实录》记载统计,1645-1651年间,仅顺治朝就祭孔14次,且每次祭拜均十分恭谨虔诚。后世清帝亦多如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上诣先师庙释奠,至大成门,降舆步入,行三跪九拜礼。遣官祭崇圣祠,分献四

配”^[14]^{26 987},又“上谒孔林。至墓门。降舆、步入墓前。北面跪。三酹酒毕。行三拜礼”^[14]^{26 989}。

这些祭孔典礼的不断重复举行,其目的在于清帝想借典礼仪式来表达对儒家道统的尊崇,同时借助仪式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意涵,来昭告天下清朝的统治与传统的中原王朝并无二致,从而确立并强化清朝统治的道统性。

同时,孔庙祀典的规格在清代也不断升级。康熙时,祭酒王士禛上书曰:“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6]⁹⁵² 建议用祭天子之礼祭拜孔子,以示尊崇。

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曲柄黄盖,留供庙庭。世宗临雍,止称诣学。案前上香、奠帛、献爵,跪而不立。黄瓦饰庙,五代封王。圣诞致斋,圣讳敬避。高宗释奠,均法圣祖,躬行三献,垂为常仪。崇德报功,远轶前代。^[6]⁵³⁷

到了光绪年间,祭孔规制正式升为大祀。^[6]⁵³⁸

在确立祭拜先师孔子为国之大典的同时,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读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11]²⁰⁴

康熙九年(1670年),更是颁谕旨: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会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朕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15]^{3 065}

继续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加强儒家传统礼仪伦理的推广,这在当时及对于后世都有深远影响。雍正皇帝“凡尊崇孔子典礼,无不备至”^[16],继续采用高规格礼制祭拜孔子,以示对孔子的尊敬。

(二)儒家国家祭典的采纳与规范

清朝统治者问鼎中原后,为了政治的道统性,开始有意识地强调皇权独尊、等级差别,恰恰儒家体系中的礼乐祀典体现了统治者不可撼动的威严地位以及奉天承运的政治道统性。清朝统治者遂借助儒家文化来稳固统治地位,规范统治秩序。有清一代,国家祭祀共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中以大祀最为重要。大祀分为四种具体的祭典:一是冬至时在南郊圜丘祭天,二是夏至在北郊方泽祭地,三是每个季度都前往正东宗庙祭拜,四是春、秋时节去往正西祭拜社稷。中祀则包括祭太岁、朝日、夕月、先农等,属于国家常规祭礼。本文以大祀中的祭天仪式为例,论述满清政权对儒家礼制的借鉴与吸纳。

入关前,满族特有的传统祭祀是堂子祭天。堂子祭祀实际上是满族崇奉的萨满教的一种形式和内容都十分古朴的祭祀形式。直到皇太极时期,满族百姓乃至皇室宫廷仍以萨满教作为主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形式。汉式的祭礼大典主要成型于崇德建元之际,是皇太极依照传统儒家礼仪模式而制。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学成奏请设立坛郊社:

我汗既为天地宗子,须要象汉朝立天地坛,凡行兵出征,天年旱潦,汗当步行到坛祷祝,命道士设斋念经,每年冬至日郊天,用牛一只祭,夏至日社地,用猪羊祭,再把始祖神位入坛配享,道官唱礼,我汗当九升九奏,这便是天子敬天地的道理,朝廷当行的一宗要务。^{[17]101}

他认为,满洲的堂子祭天不足以成为国祀,只有仿效汉族设坛祭拜天地,才能得民心,才能治天下大同。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四日,定祭孔夫子庙”^{[10]1401},六月初一日,定祭太庙,福陵典礼”^{[10]1489}(此为清代太庙制度的肇端),“七月十四日,定祭天祭太庙典礼”^{[10]1538}。《满文老档》详细记载了崇德元年(1636年)的祭天仪式:

祭天,圣汗于神位东侧侍立沐手,供献祭品于神位前毕,赞引官导引,行初见礼,赞礼官赞排班,赞礼官赞进前,圣汗至正中北向立,众皆进前。听赞礼官赞跪赞叩,即行一跪三叩头礼。赞礼官赞起立,圣汗及众皆起立。赞礼官赞上香,众皆立侍,圣汗从东阶升至神位前跪,捧举香盒起立,亲三上香毕,从西阶下,仍在正中北向立。赞礼官赞跪。于是,圣汗亲奉帛酒,授侧立之官,献于神位前。俟读祝官读祝文毕,赞礼官赞叩,以大典礼,行三跪九叩头礼。撤祭物毕,赞礼官复赞叩,行一跪三叩头礼而退。^{[10]1538-1540}

虽然这种祭天仪式仍与儒家祭天大典有很大差距,但风格上已是在效仿儒家传统。崇德建元仪式在观念及其行为规范、活动体制等方面均沿袭明制,将儒家传统典礼、朝会、祭祀典礼以法定形式规范化,用以表示满清政权继承了华夏正统,可以为天下主。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依旧积极对儒家传统祭典采取吸纳态度。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第一次以帝王身份告慰上天、祭祀神明:

是日黎明,内院官奏请诣坛。上出宫,升辇,亲王以下文武各官皆从,鹵簿前导,出大清门,不奏乐。至圜丘,于昭亨门西降辇。入左门御幄,更衣毕,太常寺寺丞从棂星门内导上至阶二级,典仪官赞乐人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诸王立于阶三级,文武各官列于棂星门阶东西,典仪官赞迎神,协律郎奏迎神乐,赞引官赞升坛,导上至神位前,捧香官跪于上左傍捧香,赞引官赞跪上香,上跪,三上香毕,赞复位,上复位,乐止。赞引官赞俯伏,兴,上行四跪四叩头礼,各官亦随行礼。典仪官赞献玉帛,协律郎奉献玉帛乐,赞引官导上至神位前,捧玉帛官二员,跪上左右捧玉帛,赞引官赞跪献玉帛,上跪受玉帛,献毕,授捧玉帛官置于案上,赞复位,上复位,乐止。典仪官赞行初献礼,协律郎奏初献乐,赞引官导上至神位前,捧爵官、接爵官跪于上左右捧爵,赞引官赞跪献爵,上跪受爵,献毕,授接爵官,置于案上。赞引官赞诣读祝所,上诣读祝所。乐止,上跪,各官皆跪,读祝文。……读毕,赞乐,赞引官赞俯伏,兴,上行一跪一叩头礼,各官皆随行礼,赞复位,上复位,乐止。典仪官赞行亚献礼,如初献仪。典仪官赞行终献礼,如亚献仪。典仪官赞撤饌,协律郎奏乐,执事官撤饌毕,乐止。典仪官赞送神,协律郎奏送神乐,赞引官赞俯伏,兴,上行四跪四叩头礼,各官亦随行礼,乐止。典仪官赞执事官将祝文,祭帛诸祭物捧至燎所,上退位于拜位之东,祝帛过上前,上鞠躬。典仪官赞诣燎所前视焚祝帛,协律郎奏乐,赞引官导上至燎所,焚祝帛,灌奠。赞礼毕,赞引官导上诣更衣所,上衣黄衣,南向坐,诸王文武各官侍立。^{[11]605}

此时的祭天仪式程序就已较为规范化,仪式共8个程序,依次为:迎神、献玉帛、初献、亚献、终献、撤饌、送神、望燎,即“八奏”,并且每个祭祀环节中都配有相应的由协律郎吹奏的礼仪音乐。同时,典礼过程由专职机构和职官负责管理。这都不同程度地表明,儒家祭祀典礼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躬亲必行的

祭祀大典。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各朝依旧沿袭此制,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建设,不断按照自己的理解规范国家祭祀制度的建设。

同时,清代诸帝均表现了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举凡祭祀必躬亲行之,通过祭祀活动以彰显其道统的合法性。

二、庙堂化的萨满祭祀与民族文化性的延续

满族文化是在女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朝鲜等民族文化成分之后形成的,其特征主要是满文、骑射和萨满信仰。满族笃信萨满教,萨满文化在满洲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以萨满信仰为根本的满族文化也成为满族自我认同、与其他民族进行区分的民族意识的具体表现。即使在入关后,大量借鉴和吸收汉族文化之后,清朝皇帝仍未抛弃原属于满族的萨满信仰。相反,萨满信仰作为增强满族凝聚力的一种手段,被加以尊重和传承。直到清末,诸如堂子、坤宁宫等萨满祭祀始终没有因为身处儒家文化的辐射圈而退出清帝国的历史舞台。清朝诸帝只是就各种满洲祀典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在保持本民族风格的同时,掺杂儒家文化因素,将原始的萨满祭祀制度化、朝堂化。

“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16]2553}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立神杆^①。对天神的祭祀开始成为满族萨满教的一项主要内容。努尔哈赤时期,举凡出征、凯旋、誓盟均要举行祭天或者祭堂子。例如,“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明出兵袭金,努尔哈赤出征前往祭堂子,以祈求上天保佑”^{[10]67};“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六日,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毕,升帐”^{[18]376}。皇太极继位后,扩建大内宫闱。清宁宫成为祭祀萨满之所,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模式遂肇端于此。天聪五年(1631年)“辛未春正月乙亥卯刻,上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行礼,还宫拜神”^{[19]565}。同年,“汗率众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10]1187}。堂子祭祀已成为军队出征、凯旋时不可或缺的国家重典。“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升座。”^{[10]1187}

整体上来说,天命、天聪年间的祭祀活动,不仅在祭祀仪式基本无异于前代,并未出现模仿汉族儒家礼仪的态势,而且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满洲风格,延

续了外祭天、内祭神的特点。

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十八日,皇太极颁旨:

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复思天者,上帝也。……春秋举杆至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著礼部传谕周知。^{[10]1514}

皇太极的崇德建制将堂子国祭定为国制,使其成为皇权的象征。堂子祭祀的仪式、程序制定已经开始明显向汉式儒家祭祀大典礼制倾斜,形成了固定的、严格的汉式祭祀程序。例如,列大驾卤簿至堂子外,诣堂子,拜天时,行三跪九叩头礼等,渐渐等级化、庙堂化、制度化,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借鉴与认同。

入主中原后,满清政权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帝国,因此,清朝皇帝坚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的同时,必不可少地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以清宫萨满祭祀为例,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萨满祭祀就受到了儒家祭祀礼制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宫廷萨满教的祭祀仪式进一步规范。如,元旦拜堂子时,增加鸣赞赞礼环节,康熙十一年(1672年)谕:“人君对越神祇,务尽其诚敬之心,礼仪节文,宜臻明备。每年元旦,躬诣堂子展拜,可令鸣赞赞礼,永著为例。”^{[20]6850}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编撰。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乾隆帝令允禄等大臣整理、编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下简称《典礼》),将零散记录的满族萨满祀典、军事祀典完全典礼化和制度化。《典礼》的编制成书标志着满族萨满信仰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典礼》详细记载了包括堂祭和坤宁宫祭在内的满族所固有的对自然、祖先神祇的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礼仪的方式、地点、人员、物、器用、忌讳等。

虽然满洲萨满祭祀在精神实质方面仍然保持本民族传统宗教的独特性,但其文化表现形式已经相当“汉式庙堂”化。仅就祭辞而论,首先《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的数十首萨满祝辞中的祭神包括了佛、菩萨、关帝等客神,这明显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其次,夕祭神、背灯祭神祝辞原来使用满语诵读,且为口耳相传。满清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满语荒疏,致使部分神灵的原义已弄不清楚。再者,《典礼》中所载祝辞均是经过详加斟酌的,这就形成了一套诸神皆宜的萨满教祝辞语。祝辞首先言所请神名,然后报祝者之身份,最后念千篇一律的祷辞:“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

^①神杆又称索伦杆,俗称通天柱、还愿杆,为萨满祭天祀神必不可少之物,以联系上天与人间。

卫于后而护于前 畀以嘉祥兮 齿其儿而发其黄兮 年其增而岁其长兮 根其固而身体康兮 神兮祝我 神兮佑我 永我年而寿我兮。”^{[12]255} 这种字句工整、词藻华丽、模式化的祝辞是一种“汉式庙堂”形态的萨满教。

满洲萨满祭祀经过康熙、雍正、乾隆朝刻意的制度化、规范化后,被以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代代相传。制度化的满洲萨满祭祀被纳入会典,确定为国祀,与汉族的儒家祭典并行使用。朝堂化、制度化是萨满祭祀的外在表现,其文化内核依旧是本民族的文化心性。自此,满、汉两种祭祀礼制并行不悖,这种体系的确立正是清前期诸位帝王对于满汉两种祭祀体制文化调适的产物。

三、结语

当满洲八旗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面对的是两个文化世界:满族的传统和被

征服者的传统。由于急于确立道统的合法性,清前期的几位帝王便努力在“德治”上下功夫,他们通过种种措施了解、掌握儒家文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这主要体现在对儒家祭典仪式的采用上。但这不能简单地将清朝皇帝理解为汉族文化的“俘虏”,在清朝皇帝的内心深处,“满洲之道”与“尊崇儒教”二者是不会互相抵触的,儒家文化的普遍主义和固有的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是能够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中和平共处的。于是,他们一边借鉴汉制,一边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政治重要性抱有高度的警觉性,有意识地坚守着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萨满信仰,并以此作为增强满族凝聚力的一种手段。有清一代,清朝皇帝的外在标准多次变化,但是真正的满洲身份却从未消失过。正是他们巧妙地抉择、调适着帝国统治内不同的文化,并将其杂揉于一体,才使得清朝皇帝树立了自己天下共主的形象。

参考文献:

- [1] 刘体智. 异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 何炳棣. 捍卫“汉化”: 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J]. 清史研究, 2000 (1)(3): 113-120, 101-110.
- [3] 刘凤云, 刘文鹏. 清代的国家认同: “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4]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5] [美]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6]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7] 张分田, 刘方玲. 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链接[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6): 127-133.
- [8] 刘方玲. 清朝前期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D]. 南开大学, 2010.
- [9] 蔡美彪. 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J]. 历史研究, 1987 (3): 133-146.
-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老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1] 世祖章实录[M]/清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史编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1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4] 高宗纯皇帝实录[M]/清实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圣祖仁皇帝实录[M]/清实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正朝起居注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7] 李鸿彬, 孙方明.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2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1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 [19] 太宗文皇帝实录[M]/清实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90.
- [21] 赵志忠. 满洲萨满神歌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程铁标)

The Culture Choice Between the Wor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Manchuis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UI Xin^{1, 2}

(1.Center of Minor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2.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Qing regime was established, the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 faced two different cultural worlds: the world with Manchu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other world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conquered. They tried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by using series of method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Confucia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Qing emperors kept a clear and conscious mind on original Manchu culture—Shamanistic beliefs with high alertness on the predominant political status of their own ethnic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sort of political way to enhance Manchu cohesion.

Key words: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orship of Confucianism; Shaman belief; sacrificial ceremony; cultural adjustment